

1953年7月27日,中朝方面代表(右)和联合国军代表在板门店正式签署朝鲜停战协议。

朝鲜战争期间 中朝高层的矛盾、分歧及解决

(下)

文/沈志华

关于停战谈判签字的时机问题

第五次战役以后,中国方面也感到战争难以继续下去了。1951年5月下旬,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并决定了“边谈边打,争取谈判解决问题”的方针。毛泽东随后请金日成于6月3日抵达北京进行商议,接着又要求斯大林接见金日成和高岗,同时希望在苏联养病的林彪也参加会谈。经斯大林同意,6月10日金日成和高岗乘苏联派来的专机飞往莫斯科。

他们与斯大林交流了看法之后,于6月13日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斯大林也来电表示,“我们认为,现在停战是件好事。”

据苏联大使观察,“朝鲜领导人对于停战谈判有些戒心,尽管他们

没有公开和直接地表达出来”。金日成从北京回来以后,心情十分沮丧,认为苏联在联合国的代表马立克6月23日呼吁停战谈判的发言“是中国力图达到停战和摆脱援助朝鲜这一负担的最明显的表示”,甚至在马立克发表声明之后的几天时间里,北朝鲜的报界以及其他宣传机关,对此都“没有进行详细的解释,也没有发表任何评论文章”。虽然朝鲜领导人后来也“认识到了缔结停战协定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必要性”,但他们认为中国代表团(主要是其负责人李克农)为能达成停战协定而对美国人过分宽容和让步,同时也抱怨中国人在谈判过程中没有及时地、充分地听取朝鲜代表的意见。特别是当7月27日毛泽东通知金日

成,如果美国人坚持将现有的前线作为分界线的话,那么中国人认为可以向美国人做出让步时,金日成表示了极大的不满。

他立即答复说,“这种让步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意味着对朝鲜的“严重的政治打击”。金日成甚至对朴宪永说:“我宁愿在没有中国人的帮助下继续进行战争,也不愿意做这种让步。”

后来因美国代表在分界线问题上提出了过分要求,并在谈判区进行挑衅,中方表现出强硬立场,才使朝鲜人的情绪有所好转。不过,苏联大使注意到,“最近数月来,朝鲜人对中国人的态度明显地冷淡了,朝鲜人更加坚定了依靠苏联的方针。”

然而,中朝双方对谈判的态度

不久便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1952年下半年,在朝鲜战场双方基本取得力量平衡的同时,板门店的停战谈判却陷入了僵局,问题竟胶着在毛泽东起初认为最容易解决的战俘问题上。此时,毛泽东主张把战争继续下去,而在和平谈判问题上坚决不能让步,但朝鲜方面却希望接受美国的停战条件,尽快在停战谈判协定上签字。斯大林从苏联与美国对抗的全球战略出发,再次支持了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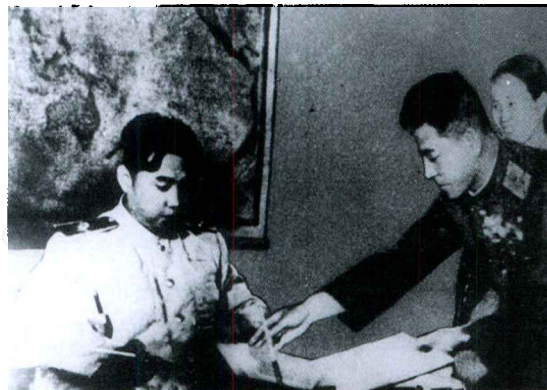
1952年2月板门店谈判达成协议:在签订停战协定后90天内召开相关国家的政治会议解决朝鲜问题,但在其他议程,特别是战俘问题上还有争议。这时,朝方主张尽快结束谈判,金日成还直接向毛泽东表示出“不愿继续进行战争”的意见。拉祖瓦耶夫向莫斯科报告说:“金日成在与南日讨论谈判陷入死胡同的原因时表示了这样一种看法:应该建议签订停战协定,而把所有未解决的问题移交给政治会议去研究。金日成认为拖延谈判是不利的,因为美国的空军正在继续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造成惨重的损失。他看不到继续就战俘问题进行争论有什么合理性,因为这些争论正在导致更大的损失”。“金日成指示南日弄清楚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并建议以李克农的名义在战俘问题上做出让步”。拉祖瓦耶夫还反映,中国领导人“担心大量的苏联军备的供给会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而减少或中断”,并认为匆忙地解决问题,“只能相反地导致削弱中朝方面的力量”。李克农认为,如果不发动国际社会的舆论力量,如果不作长期斗争的准备,那么美国人是不会做出让步的。毛泽东也是这样判断

谈判前景的,毛泽东给李克农下达了这样的指示:只有坚持锲而不舍、坚定不移的立场,你们才能赢得主动权并迫使敌人做出让步。为了在谈判中实现这一目标,你们应该准备与敌人再作几个月的较量。

5月2日,朝鲜停战谈判五项议程中的四项已经全部达成协议,但在第四项议程,即关于战俘安排问题上,美国方面提出了自愿遣返的原则,而中国方面坚持应全部遣返,双方的谈判由此陷入僵局。朝鲜领导人原指望不晚于5月份与美国人签订停战协定,并依此来计划安排1952年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没想到谈判因战俘问题产生争议而拖延下来,“这使朝鲜领导人感到莫大的失望。金日成建议中国同志在战俘问题上做出让步,并争取签订停战协定”。或许是考虑了朝方的意见,7月3日,中朝代表团提出了新建议,除非朝鲜籍战俘仍需全部遣返外,同意朝鲜籍战俘无须全部遣返,“即其居住地在敌对方的朝鲜籍战俘,应返回敌对方领土;在应召入伍前居住于俘获方领土上的朝鲜籍战俘,应全部留在原处并应被释放遣送回家”。但是美国方面不顾中朝方面的一再退让(包括已不再坚持遣返全部被俘人员),于7月13日提出了总共遣返83000人(包括人民军被俘人员的80%和志愿军被俘人员的32%)的概数,并声称这是最后的、坚定的、不可改变的方案。中朝方面被迫做出最后选择。

对此,中国领导人的态度十分坚决。毛泽东在7月15日给金日成的电报中说,在敌人狂轰滥炸的军事压力面前,接受其挑拨性和引诱性而并非真正让步的方案,对中朝方面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极为不利

的。战争继续下去,固然会给朝鲜人民和志愿军带来进一步的损失,但中朝人民也在战争中愈战愈强,鼓舞着全世界爱好和平运动的人民去反对侵略战争,并推动了全世界保卫和平运动的发展。战争使美国的



7月27日,金日成于平壤在停战协定和补充协议上签字。



7月27日,克拉克于汶山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7月28日,彭德怀于开城在停战协定和补充协议上签字。

主要力量陷在东方继续遭受损失,而苏联的建设得到了加强并影响着各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因而也就推迟了世界大战的暴发。毛泽东保证,中国人民愿尽一切可能帮助朝鲜人民解决困难。总之,“在现时形势下,接受敌人这一方案必然要长他人志气来灭自己威风”。最后,毛泽东不无用意地告诉金日成,中方的看法和方针,“当转报菲利波夫同志征求他的意见,得复再告”。同日,毛泽东也致电斯大林,“主张坚决拒绝敌人这种挑拨性和引诱性方案”,并表示准备战争扩大。毛泽东还通报说,“金日成同志对此有不同看法”。尽管金日成在回电中表示赞同毛泽东对当前局势的分析,并感谢中国将全力提供援助的承诺。但在同一天给斯大林的电报中,金日成抱怨说,由于消极防御的方针,敌方轰炸给朝鲜的城市和平民带来了极大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拒绝接受敌方的条件。虽然他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

见,但还是希望尽快停战:“我们必须坚决力争尽快签订停战协定、实现停火和根据日内瓦公约交换所有战俘。这些要求会得到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支持,并使我们从被动的局面中摆脱出来。”

中朝之间在谈判中的战俘问题上持有不同立场,除了政治上的考虑之外,还有一个更为实际的原因,即双方的战俘政策完全不同。由于受国内战争传统做法的影响和缺乏国际斗争经验,中方从一开始就未曾想过扣留战俘。1950年11月17日彭德怀致电军委,拟在战役发起前释放100名战俘。18日毛泽东复电,“释放一批战俘很对。今后对战俘应随时分批放走,不要请示”。这样,中方掌握的战俘即相应减少。此外,1951年11月中朝商定,为便于释放战俘工作,以后南朝鲜战俘交由人民军管理,而志愿军只管理其他国家的战俘。这样,中方实际看管的战俘人员十分有限,没有多少谈判的本钱,这大概也是中国主张“全

部遣返”的原因之一。而朝方出于战后经济建设需要劳动力的考虑,则扣留了13094名李承晚军队的战俘,其中一些人在人民军中服兵役,其余的人则在内务部和铁道部从事不同的工作。此外,还扣留了战争前期从南朝鲜被动员加入人民军的数万人。在这种情况下,朝鲜领导人当然不可能坚持“全部遣返”的原则。

问题最后还是在莫斯科得到解决的。7月15日毛泽东电告斯大林美方得出的方案,“两者比例极不相称,敌人企图以此来挑拨朝中人民的战斗团结”。“在敌人的压力下屈服,对我极为不利”,并表示即使谈判破裂,也绝不让步,“因为这个问题是个政治问题,不但对朝中两国,而且对整个革命阵营都有影响”。第二天斯大林即复电:“你们在和平谈判中所持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

周恩来随后于8月访苏,并与斯大林举行了多次会谈。中途赶来的金日成、朴宪永和彭德怀参加了后期会谈。除了讨论中国经济建设的问题外,会谈的重点在于确定以后战争的方针。周恩来介绍了战场上中朝力量的情况,认为“现在我们有足够的把握,可以进行更长时间的作战,并且因为建立了坚固的坑道工事,也经得住轰炸”。关于战俘问题,斯大林首先指出,美国人想按自己的主张解决战俘问题,而根据国际法,交战各方必须遣返除罪犯以外的所有战俘。斯大林问毛泽东对战俘问题是怎样考虑的,是让步还是坚持自己的主张。周恩来简要地介绍了在这个问题上中朝之间存在的分歧,并表达了毛泽东“必须坚持遣返全部战俘”的看法。周恩来说:“朝鲜人以为,继续打下去不利,



遣返的美军俘虏。



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接见志愿军代表团。

因为每天的损失要超过在遣返上有争议的战俘人数,而停战对美国不利。毛泽东则认为,战争打下去对我们有利,因为这打乱了美国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斯大林当即肯定说:“毛泽东是对的。这场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北朝鲜人除了在战争中遭到牺牲以外,并没有输掉任何东西。美国意识到,这场战争对他们是不利的,必须结束它,特别是当他们知道仍有我军驻在中国以后。需要的是毅力和耐心”。斯大林还提出了一个更能触动中国领导人神经的问题,他提醒周恩来说:“对美国必须强硬。中国同志必须了解,如果美国不输掉这场战争,那么中国永远也收复不了台湾”。关于解决战俘问题的具体方法,周恩来谈到,如果美国人做出某些让步,那么可以按以下方案之一继续谈判:第一,在美国仍然坚持遣返部分战俘的情况下,宣布扣留同样比例的美韩战俘;第二,战俘问题交给中立国(如印度)进行调解;第三,先签订停战协定,战俘问题留待以后解决。在交谈

中,斯大林倾向第一方案,而周恩来重点谈的是第二方案。

不过,他们一致赞同的前提是首先坚持全部遣返战俘,并要美国先行表示让步,而不能在美国的恐吓面前退缩。

对平壤的说服工作,自然还要莫斯科出面。在9月4日与金日成会面时,斯大林问到,朝中之间在谈判问题上是否存在某种分歧。金日成回答:“我们之间不存在原则上的分歧。”

斯大林立即说:“我们在此已经与中国代表团讨论了这一问题,并表达了这样的建议:不同意美国人提出的关于战俘问题的条件而坚持自己的条件”。“如果美国人不愿意遣返20%的中朝战俘,那么他们的那20%的战俘也不能返回,一直到他们不再扣押中朝战俘为止。”斯大林最后以肯定的语气结束了这一话题:“这就是我们对此问题的看法。”

此后直到斯大林去世前,金日成没有再提立即停战的主张。不过,在战争即将结束之前,中朝之间在

是否立即签署停战协定的问题上又发生了争论,这是战争期间的最后一次分歧。1953年3月以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及战争方针发生改变,从而促进了朝鲜停战谈判的进程。但李承晚不想停战,并以擅自释放战俘的做法破坏协定的签字。为此,中方主张再发动一次战役,借以争取更好的停战条件。而朝方则要求马上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对李承晚释放战俘的行为不必追究。彭德怀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按自己的意愿发动了一次较大规模的阵地突破战,并取得成功。

显然,在停战问题上,金日成考虑的是朝鲜的实际利益,既然无望在战争中取胜,那么最好在维持现状的前提下尽早结束战争,转而进行经济建设,巩固对北朝鲜的统治。而毛泽东则着眼于两个阵营之间对抗的总体形势,着眼于在东北亚乃至整个亚洲的安全利益。惟其如此,在中朝之间发生分歧时,毛泽东才屡屡得到莫斯科的支持。

总之,上述中朝领导人之间矛盾和分歧发展及其解决的过程,除了历史因素以外,反映了阵营内部国家关系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即当国家主权利益与整个阵营的共同利益发生冲突时,常常是前者服从后者。总体说来,中朝之间的问题,并不单纯是各自利益的抵触,而是阵营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之间存在着差异。所以,苏联立场的偏向,也并非仅仅是考虑到照顾中国的意见——尽管相对来说莫斯科处理同毛泽东的关系时更加慎重,而更多地是因为中国的主张比较符合斯大林认定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亚洲冷战中的总体利益。

(《大道低迴》)